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

——以大理、丽江为例^{*1}

毕丽芳

(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 云南昆明 650214)

【摘要】:民族文化旅游能否实现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取决于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否得到科学开发和保护, 进一步决定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根据不同的资源与区位, 采用不同的开发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选择民族旅游目的地大理、丽江为研究平台, 从空间、管理、资源等角度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 ①空间上采取旅游联动开发模式, 区域内为“核心—边缘”联动模式, 区域间为“双核联动”模式, 大区域为“点—轴”联动模式; ②管理模式上结合民族地区特色, 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模式; ③结合大理、丽江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采取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模式。

【关键词】:民族文化旅游; 开发模式; 大理、丽江

【中图分类号】:F590.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17)04-0489-05

doi:10.3969/j.issn.1005-8141.2017.04.021

云南是旅游大省, 而民族文化是云南旅游发展的主要特色之一。民族文化旅游能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取决于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否得到科学开发和保护, 决定于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旅游者的需求和消费水平的提升, 以往简单的开发模式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 更不容易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虽然丰富, 但针对其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选择民族旅游目的地大理、丽江为研究平台, 探讨了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一方面, 可对民族地区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开展针对性的市场宣传、营销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另一方面, 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1 理论依据

¹ 收稿日期:2017-02-04; 修订日期:2017-03-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乡村旅游土地增值收益公平分配机制研究”(编号:71363032); 国家旅游局科研项目“青藏高原青海地区旅游供给优化模型研究”(编号:16TAAG028); 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青海省旅游—资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编号:15024);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社会、边疆及生态环境研究”建设项目资助。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简介:毕丽芳(1983-), 女(彝族), 云南省石林人, 博士, 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旅游与旅游效应研究。

本研究是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博弈论、区域发展理论、需求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论上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在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与带动性,对各利益主体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论角度分析,从全局角度考虑主体与客体的利益分配、义务规定和责任划分,进一步通过协同合作实现旅游区利益效应最大化^[1]。区域发展理论的要点在于对发展现象的价值判断,提倡发展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提升。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研究来说,以科学全面的旅游发展观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2]。从需求理论看,人类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向深层次扩展。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只会呈现出单一的需要,是各种需要的叠加,个人内在的需要形成了旅游内驱力,是形成旅游期望、旅游动机等一系列行为的根本动力^[3]。空间结构理论揭示空间结构变化的动力和演变的阶段特征与规律,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目的地及其紧邻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区域旅游竞争性合作模式^[4]。目前,旅游可持续发展已得到人们普遍且广泛的重视,成为各地旅游业发展的主流指导思想。

2 研究区概况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为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是云南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旅游资源以“风花雪月、苍山洱海、妙香佛国、南诏大理文化、白族风情、五朵金花、天龙八部”为特色。大理苍山洱海蝴蝶泉、三塔古城三月街、一部《五朵金花》和《天龙八部》、一曲《小河淌水》和《大理三月好风光》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天龙八部影视城成为大理著名的景区,这些支撑大理旅游的金字招牌无一例外都包蕴着精彩别致的文化基因。可以说,民族文化是大理旅游发展之魂,旅游是大理文化走向世界的载体。

丽江是古代茶马古道的重镇,丽江古城始建于元初,在南宋时期初具规模,“大研镇”丽江古城发展至今已经有 800 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丽江市坚持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成功塑造了文化这个丽江旅游之魂,使“文化丽江、丽江文化旅游”品牌蜚声海内外。民族文化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促进了丽江的社会和谐与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旅游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

3 大理、丽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空间上的矛盾

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在空间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资源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导致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古城特色逐渐丧失。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商业化和“空巢”现象使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民族气息越来越淡薄,流失速度也在加快,反映了在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过程中,深度扩展衍生产品的投入不足、系列化程度不高;民族文化的传承队伍后继乏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保护与弘扬的原则有待进一步宣传与实施。

3.2 旅游体验不足

大理和丽江民族文化资源总体开发程度不高,文化元素的开发和植入不够、品位不高、对民族文化的许多层面,特别是精神文化层面还未能很好的挖掘并形成产品,不能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在产品和服务设计上,缺乏参与性体验项目的植入,大部分有趣的民俗活动还处于参观层面,没有机会体验其中的乐趣。因此,应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文化品位,将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旅游产品(图 1)。大理、丽江各景区的收入结构较单一,仅以门票收入为主,可提供消费的项目有限,游客在大理、丽江旅游大部分时候都局限于参观游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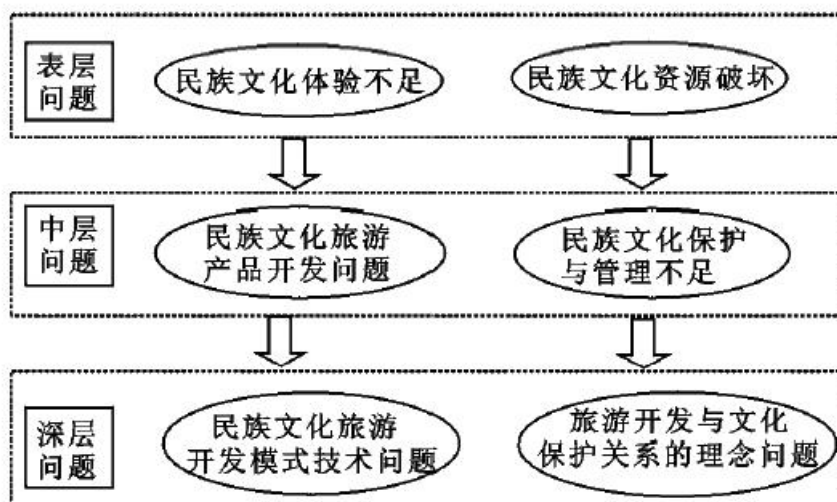


图1 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根源分析

3.3 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 民族文化的过度利用和内涵文化价值开发展示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 造成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首先, 民族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并不是因为民族文化资源不够丰富造成的, 而是因为对热点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冷点资源保护乏力所致, 如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的过度商业化发展。其次, 对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开发不足。民族文化的衍生产品较少, 基本上都是依靠民族文化资源本身, 旅游开发形式单一, 主要以观光功能为主, 造成旅游流过于集中。如丽江古城内特色客栈的开发, 使古城内滞留游客急剧增加, 无论是环境还是资源都不堪重负。第三, 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仅强调对单体资源的保护, 忽视了周边环境与民族文化资源环境的协调与保护。如丽江古城与新城区相连, 无论是从景观还是从视觉、环境上都没有达到协调统一, 反而加快了对古城遗址的破坏。第四, 不规范经营行为普遍存在。商品价格因人而异, 引起外来居民与游客的反感与不满, 部分旅游经营者为了吸引游客, 随意篡改传统婚俗,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民族文化的原创性。

3.4 旅游产品同质化

“同质化”是指同一大类中不同品牌的商品在性能、外观甚至营销手段上相互模仿, 以至逐渐趋同的现象。大理、丽江旅游商品以外地旅游商品为主, 当地特有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很少, 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差异不大, 没有突出地方特色, 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 因此发掘具有本地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成为旅游开发的重点之一。

4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4.1 旅游联动开发模式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空间联合开发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不但可极大地拓宽资源空间和市场空间, 优化旅游线路组合, 而且可有效地抑制地方割据和不正当的竞争, 在空间上联合开发可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整体规划, 使景区开发有先有后, 有效防止重复建设和破坏性开发, 使互补的民族文化资源产生良好的组合效果。

区域内联动——核心—边缘开发模式: 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访, 但由于知名度太高, 致使游客高度集中在某些核心区域, 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应通过与周边地区联合, 以合理的政策引导分散核心区的游客压力, 延长游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 提高目的地旅游收入, 促进民族文化旅游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大理、丽江较适合采取核心城市带

动周边小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区域内丰厚的资源在整合、优化之后,增强整体竞争力。这就要求区域内的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有准确的定位,充分发挥大理、丽江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积极引导与规范各行政主体的行为,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科学管理”原则,实现核心牵引,边缘联动,协调发展。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旅游发展组合模式中,大理市是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或中央城市,具有集聚与辐射效应,同时具有旅游资源禀赋、城市规模、发展水平、接待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而成为中心集散地(图2)。丽江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闻名海内外,国内外游客因为古城而吸引到丽江,所以丽江古城应作为丽江市旅游发展的核心,通过交通连接各个县和景区,带动景区发展,促进区域旅游的整体发展(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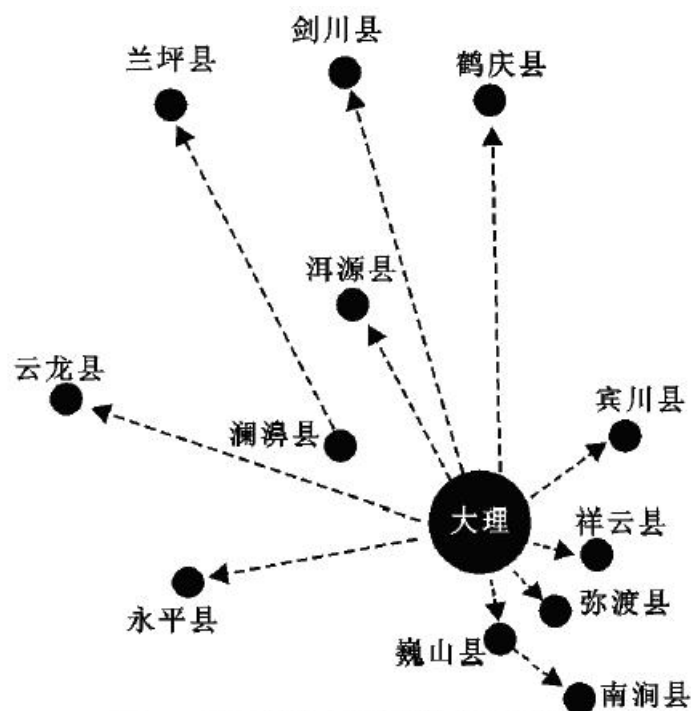


图2 大理州核心边缘联动开发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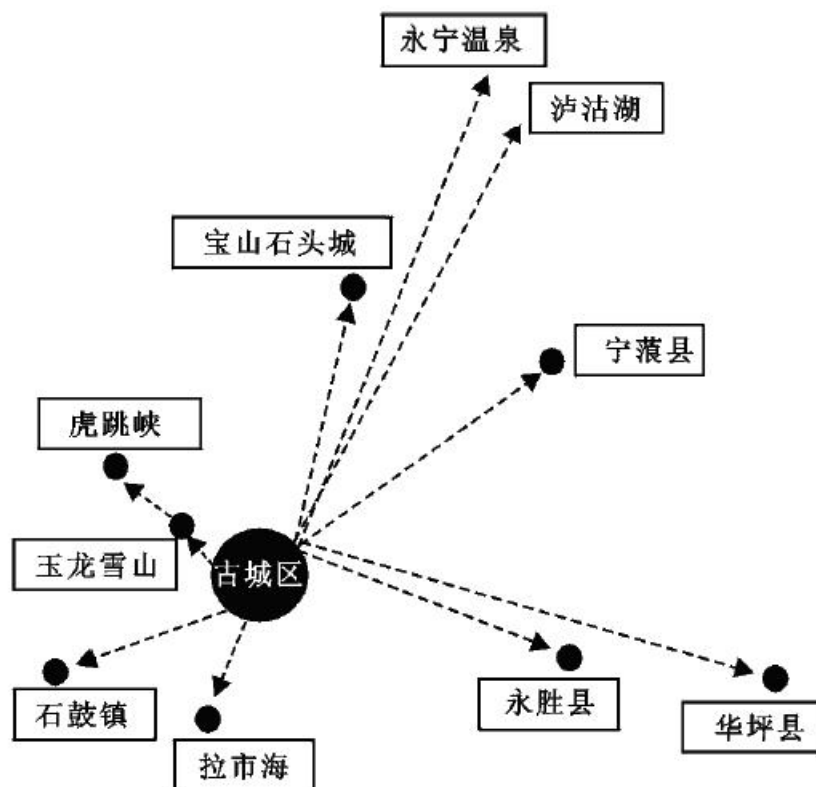


图 3 丽江市核心—边缘联动开发模式

区域间联动——双核联动开发模式:大理和丽江在一条旅游线路上,两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旅游地位旗鼓相当,不论是城市还是资源都可形成市场共轭或资源互补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合作关系,具有发展双核联动模式的优势。一般情况下,走滇西北旅游线路的游客都会选择大理、丽江顺路旅游,两者属于“资源—资源、市场—市场”、双向“共生性双核”联动发展模式,两地既有市场共轭,又有资源互补,依托交通、加强资源整合,积极培育特色鲜明、综合配套的复合型旅游线路,形成大理—丽江主干线旅游线路和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网络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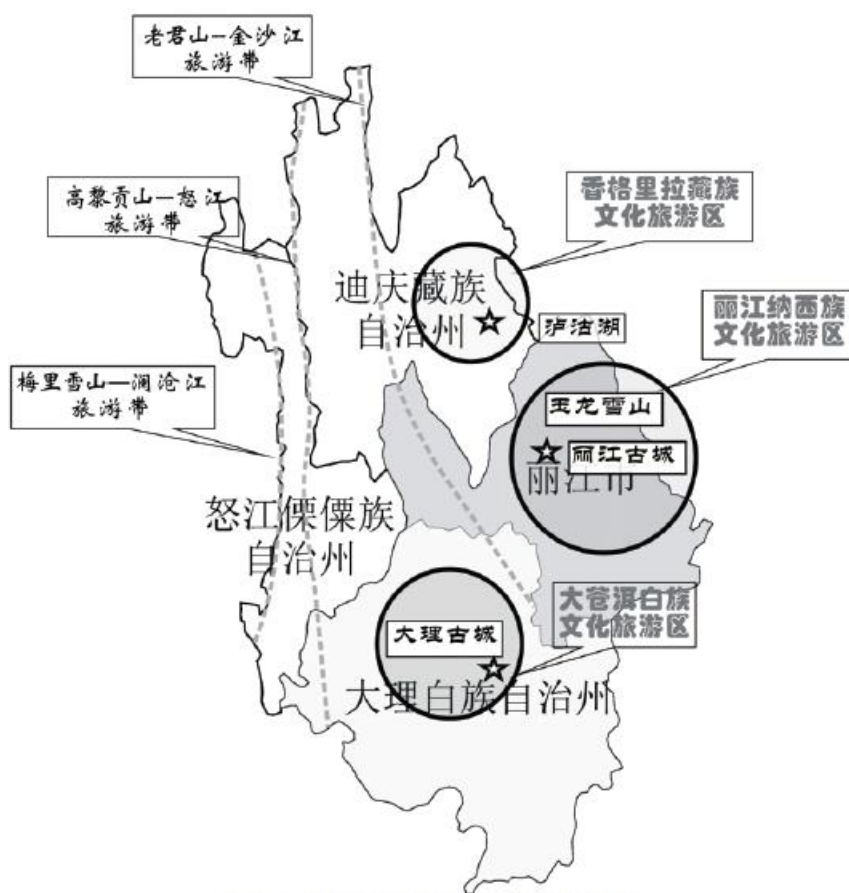


图 4 滇西北联动开发模式板块

滇西北联动——一点一轴开发模式：点一轴开发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选择若干比较优势明显的、具有开发潜力的重要线状基础设施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5]。点一轴开发模式是促进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交通联动的基础上跨区域合作不仅能够优势互补、统一营销，还能共享市场，从而达到共同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滇西北是云南省少数民族风情游的热点线路，形成了三个旅游中心：大理古城、丽江古城、香格里拉县城；三片旅游区：大苍洱白族文化旅游区、丽江纳西族文化旅游区、香格里拉藏族文化旅游区；三条旅游带：梅里雪山—澜沧江旅游带、高黎贡山—怒江旅游带、老君山—金沙江旅游带（图 4）。滇西北旅游资源风格迥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无法互相替代。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造跨行政区域的旅游产业链，突破区域壁垒，充分发挥核心区域资源优势和辐射作用，促进民族文化资源合理流动，主动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联合，不仅滇西北可联动开发，还可逐步实现云南省内联动和西南地区联动，扩大区域旅游的合作范围。通过市场整合、营销整合、监管整合、价格整合和线路整合，使滇西北成为一个大型的旅游圈，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线路。

4.2 “政府+企业+社区”管理运作模式

国内外旅游发展的实践表明，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不仅仅是表现在具备优质的旅游资源，具备和谐的旅游环境也是树立良好的旅游地形象的主要条件^[6]。旅游地社区居民与政府、旅游企业的和谐反映了民族地区总体的发展潜力。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旅游地而言，要通过当地政府、居民、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业中，实现民族文化旅游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激发民族地区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开发，促使本土文化价值的提升和再造，这是民族文化旅游面向旅游目的地要实现的发展目标。现阶段大理、丽江的旅游业发展已较成熟稳定，但是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和产品的升级，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开发中的重要性已经凸显。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管理机制的问题，一是没有让古城居民充分参与到旅游业中；二是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居民与外地客商、游客、当地政府之间都未能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反馈。坚持社区参与是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关键，优秀

民族民风的开发,主要依靠当地居民能够保持与传承淳朴的民风,民族社区好客的民风使大理、丽江更有吸引力,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比较理想的开发模式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模式(图 5)。即在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企业和基层组织的管理作用,通过立法来确定企业、基层组织、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平衡各方利益,才能使旅游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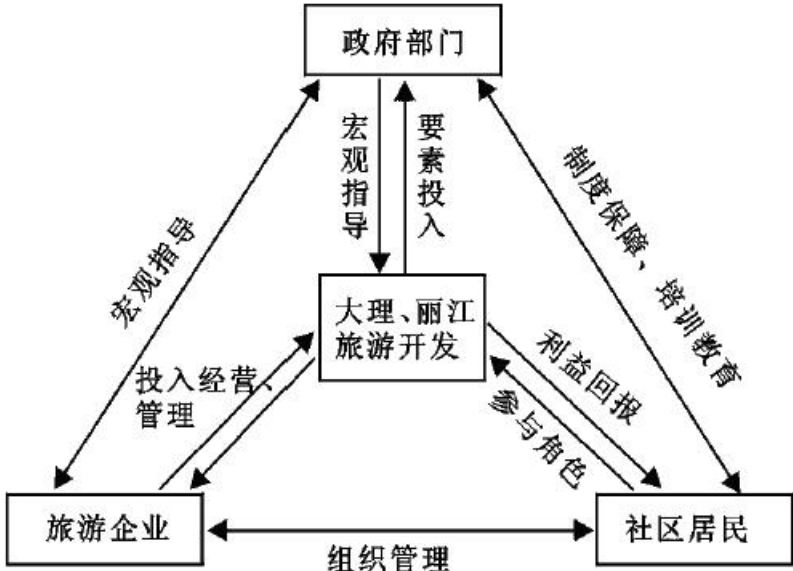


图 5 民族地区旅游管理运作模式

主要是:首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应以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复兴与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加强城乡统筹与区域合作,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区参与,发挥旅游业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是市场规划的制定者,大理、丽江的政府部门应强化旅游行政管理作为,授权赋责,明确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在旅游决策、发展战略方面的引导作用和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监督协调等管理职能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在旅游综合治理发展中的行政调控作用。其次,支持企业运作。旅游开发初期采取的是政府主导模式,因多头管理弊端突出,投资和收益不明晰,造成经营混乱和失败。因此,大理和丽江的政府部门应根据当地不同的开发现状来构建支持企业参与旅游开发运作的模式,支持企业旅游开发运作首先应构建旅游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①产权清晰。明确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价值量。②权责明确。旅游企业对债权债务关系明晰,各经济主体的权、责、利界定清楚。③政企分开。企业是经济组织,政府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企业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职能。④管理科学。旅游企业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组织制度进行经营管理活动。第三,鼓励社区参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的观光旅游开发,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也是吸引游客来访的重要旅游资源。大理、丽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应从以下方面来实现:①参与内容多元化。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应采取有力措施,丰富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的内容,在旅游决策、旅游规划、旅游经营、旅游资源环境管理等方面,让居民全方面、全过程参与。②参与模式合理化。针对大理、丽江的特色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居民的参与程度,构建居民利益共享的合理参与模式。③利益分配公平化,居民是旅游发展诸多利益主体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④参与方式多样化。政府要根据居民的参与能力来确定居民的参与内容,制定居民的参与方式,保证居民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⑤参与途径多维化。参与渠道的多维化和规范化,保证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渠道的便利和通畅。通过村委会与开发商制定公约、政府制定相应规章制度等形式来建立和规范各种参与渠道,保障居民的参与作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管理模式层次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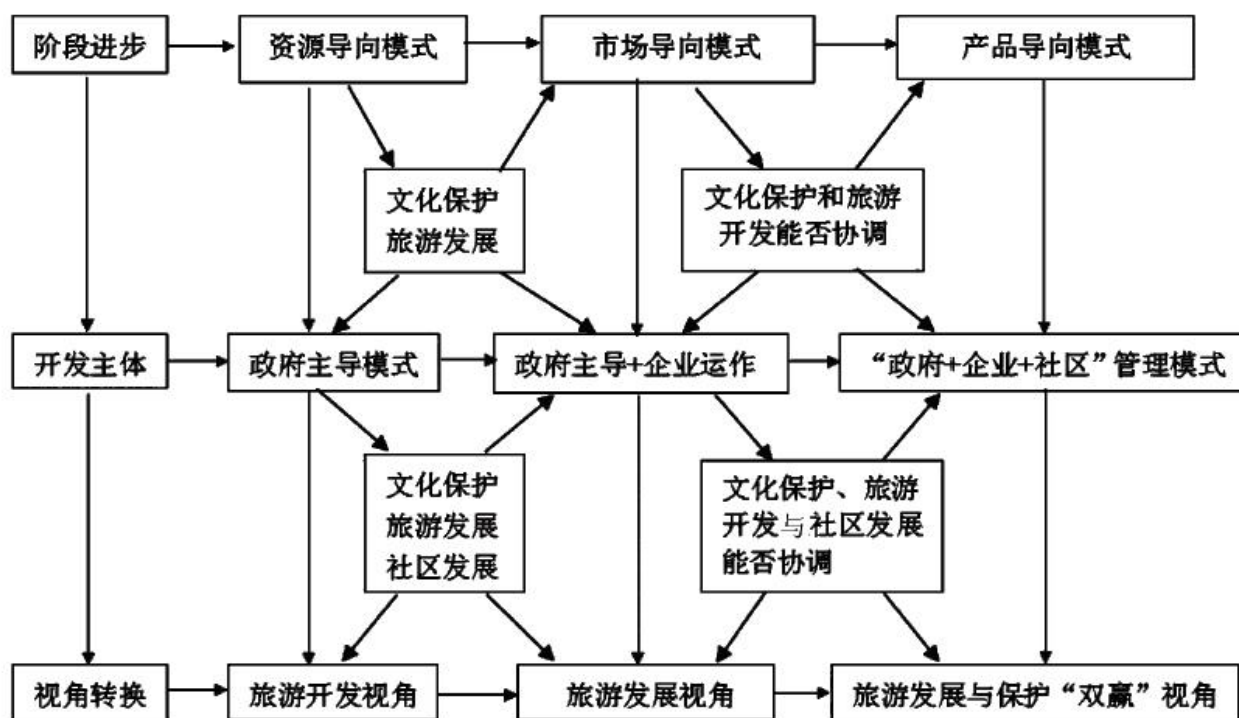


图 6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管理模式层次—递进模型

4.3 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模式

融合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旅游业“双赢”的最佳路径，民族地区旅游的根基就在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色。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在民族旅游目的地，旅游向民族文化产业广泛渗透，民族文化不断注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需要注意的是，融合并非简单相加，而是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种融合是一种与整合不同的整体性汇合，是一种“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全方位汇合^[7]。

目前，对文化与旅游融合倡导日益强烈。事实上，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仅仅浮于表面，没有实现深层次的融合。即民族文化与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两张皮”的状态，仍未实现内在的融合统一。这种融合模式虽然能够产生直观的效果，但反映出来的仅是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而非全面和深入。大理、丽江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总体上还处于一般水平，开发的基本工作机制不完善，与旅游融合的深度不够、效率不高，旅游需求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带动不足，旅游对民族文化挖掘的推动不力。

随着民族文化与旅游动态融合的协调过程，逐步从资源融合发展到技术融合、市场融合，最终达到功能融合，基本呈现出自觉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民族文化与旅游的相互作用不是停留在浅层感知文化与观光游览的融合，而是强调两者从群体文化、精神文化的深层次体融合。因此，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仅是旅游的驱动、引领、提升和民族文化的导向，也不仅仅是产生新的文化旅游业态，而是方法的交融、民族文化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只有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才能使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与旅游者的四项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上的高度融合。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云南典型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大理、丽江在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了适合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有效模式：①空间上采取旅游联动开发模式，区域内采取“核心—边缘”联动开发，区域间采取“双核联动”开发，大区域滇西北采取“点—轴”联动开发；②管理模式上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模式；③结合大理、丽江民

族文化资源优势,采取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云南省旅游发展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选择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加快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是继承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是深度融入“一路一带”战略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李正欢,郑向敏.国外旅游研究领域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6,21(10):85-91.
- [2] 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3]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
- [4] 张伟强,陈文君.旅游规划原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出版社,2005.
- [5] 涂妍.欠发达区域开发的组织模式与开发机制述评[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4):59-63.
- [6] 梁雪松.遗产廊道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7] 王克岭.微观视角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审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 [8] 汪侠.旅游地的主客满意度研究:模型及实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9] 杨荣斌.区域旅游合作结构模式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21(5):95-98.
- [10] 韦复生.耦合与创新:民族文化创意与区域旅游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新视角[J].广西民族研究,2011,(1):174-179.
- [11] 阳宁东.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演进互动研究——以九寨沟旅游表演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141-144.
- [12] 尹寿兵,刘云霞.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4):427-434.
- [13] 张补宏,徐施.民族旅游真实性研究及保护模式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0,26(3):105-108